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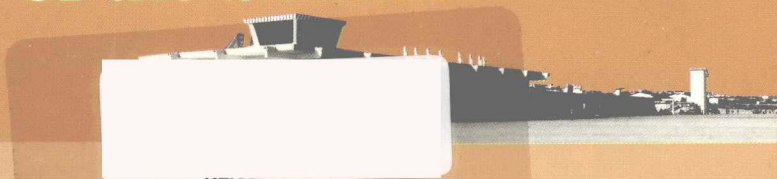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索马里史

I. M. 刘易斯 著 赵俊 译 刘鸿武 校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Somali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索马里史

M 刘易斯 著 赵俊 译 刘鸿武 校

[Redacted] History
of the Somali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 09 -2011 -466 号

©J. M. Lewis 1965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land; From Nation to State,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65 First Edition

A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land; Nation & State in the Horn of Africa, Longman
1980 Second Edition

A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land; Nation & State in the Horn of Africa, Westview
1988 Third Edition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Somali; Nation & State in the Horn of Africa, James
Currey, 2002 Fourth Edi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马里史 / (英)刘易斯著;赵俊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8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 7 - 5473 - 0489 - 1

I. ①索… II. ①刘… ②赵… III. ①索马里—历史
IV. ①K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6214 号

责任编辑：欧阳敏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 - 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23.25

字 数：300 千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489 - 1

定 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第四版前言

我是一名社会人类学家，副业是研究历史。在研究一个非洲民族（索马里民族）时，我有了一段常人没有的经历。就是这一非洲民族，其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主义孕育出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当代的“民族-国家”，还有超出“民族-国家”之外的其他内容。然而，自1960年正式摆脱欧洲人统治、获得独立以来，东北非局势一直动荡不定。索马里的政治命运历经坎坷、跌宕起伏。1960年，狂热的民族主义将索马里人凝聚在一起，满怀雄心要将索马里共和国建设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然而，未曾预料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战火却将索马里烧得体无完肤。接着，在国内外不断施压的情况下，索马里境内派系与主张分歧依然充满了强烈的火药味。

vii

更为直接的氏族、亲族效忠所具有的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持续力量，揭示了在一个并没有政治集权传统的文化中，这些低级别的认同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长期存在着紧张关系。索马里在不同时期、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曾做过多次努力，试图减轻甚至根除这些内部分歧。但是，这些努力往往威胁到民族团结，结果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从拒绝到政治镇压都有。可能最有意思的是，独裁者西亚德将军在其权力顶峰时期，即“科学社会主义”时期所倡导的公葬（以及其他措施）。早期的政治家们在确定人们身份上，曾寻求用语言上的策略以示其已经

viii 超越了氏族与部落的分界,在索马里口语中以英语(或意大利语)的前缀“ex”(即“以前所属的氏族”)来表示其出身氏族。而西亚德禁止使用所有与氏族相关的称呼,甚至包括“ex”这种委婉的用法。就在那个时期,我访问了摩加迪沙。我禁不住使点小坏,向我那些在机构中工作的索马里朋友们问道,现在要是问一个人的“ex-ex”是不是安全。那些朋友并没有被这个玩笑逗乐。

坚持放弃氏族观念是如此的受到欢迎与提倡,以至于外国的学术界也卷入进来。学术界的人本应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当然,他们通常也对索马里语缺乏充分的掌握。因此,他们的著作有助于延续这种幻象,这种幻象在神秘化索马里政治现实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幻象也激励他们使用欧洲中心论的术语“阶级”与“阶级斗争”来错误表述索马里的情况。当然,在此背后还存在着欧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的假定,即氏族组织是一种早期的、原始的政治组织形式,与现代性不容。

一些著作者甚至盛气凌人地宣称(当然并无任何证据),是欧洲殖民者将氏族制度作为一种分而治之的手段而引入到索马里!正如最早的资料显示的那样,事实恰恰相反,索马里人很早就出现了氏族制度,完全与殖民干涉无关。人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对索马里殖民者进行责难,但这个不算。当然,外国管理机构需要了解这些本土分化情况,甚至对此加以利用:这也是索马里各个集团所需要的。每个地方分化力量都设法让殖民管理者倾向于它们的特殊事业,因此,从整体上说,索马里人极其擅长于赢取这种支持。而且,正如索马里人充分表现出来的那样,也正如我在这本书中尝试忠实记叙的那样,尽管有些力量与中央政治机构有所不同,但是氏族制度显然与现代生活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和兼容的,因此也不是一种固守不变的力量。因此,在我看来,那些带着欧洲中心主义这种扭曲的意识形态化了的世界观来研究索马里社会现象的人,漠视了索马里氏族的特殊性和活力。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类似于种族主义的东西。

当然,氏族联系依然暗藏着深刻的分裂,也与一种好战的、非中央化的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成为构建稳定的、等级化的政治实体的可怕

障碍。对此,我有些担心,但我认为这也是索马里人所珍爱的带有民主倾向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代价。正如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头十年所呈现出来的政治动荡那样,索马里政治文化中的这些特点成为未来国家(或多个国家)稳定发展的难题,且这些难题极难应对。相较于很多索马里人以及我本人早期的带有理想主义的期望,在应对这些难题上,光靠索马里文化民族主义是不够的。如果说索马里历史有许多教训需要汲取的话,那么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教训。今天(2002 年),索马里人偶尔在谈及他们业已消逝的民族主义的时候,那种感受就像是病人被截肢,但依然“感觉”完好如初,好像索马里并没有崩溃。我认为,索马里人以截肢的观点来看其已经分裂的政治,部分是由于他们混淆了“国家”和“民族”。因为,就共同的文化和语言来说,索马里“国家”问题重重,而“民族”依然实实在在。

从 20 世纪 50 年代现代政党诞生到现在,我一直与索马里文化和一些文化代表人物有着联系。20 世纪 50 年代,我在准备博士阶段的田野研究前,曾第一次接触了一些为实现独立而斗争的索马里民族主义组织。在索马里进行田野调查期间(1955—1957),我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后来成为索马里政治精英的人物。我所使用的一些书面和口头材料主要得益于这种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1962 年、1964 年和 1974 年以及直到 1992 年期间更短期的进一步田野调查让我掌握了更多的材料。我最初的研究得到了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资助,后来还得到了卡内基信托基金(Carnegie Trust)和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以及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支持。联合国难民署、粮农组织和其他多个机构多次资助了我的短期访问,因此也让我有机会亲身体验了援助与发展这一神秘领域。对所有的这些机构,我深表谢意。我也要感谢索马里各届政府,它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为我提供了便利条件。虽然我出版的作品并不总是能得到它们的称赞,但自 1960 年独立以来甚至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索马里多届政府在整体上还是对我较为宽容。西亚德将军的政权对我的宽容程度令人吃

x 惊。阿卜杜勒-拉扎克·哈吉·侯赛因(他被广泛地认为是索马里最有能力的总理)总理对我就曾表达出这样的一种态度,他在将我介绍给他的内阁时说道:“这就是写我的家伙。我们并不总是喜欢他说的,但重要的是他在写我们!”^①

在索马里军人政权统治时期,我曾到索马里国家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做客,我很惊讶也很高兴遇到了很多教师,他们准备用新索马里文字筹备教材。他们也正在翻译本书的一个较早版本中的一些段落。这个新版本也是对书商伊斯梅尔·艾哈麦德(Ismail Ahmed)先生的直接回应。为了满足索马里以及欧洲的索马里学生的教学需要,他在赶印本书。我很高兴地设法满足了他的需要,即要把索马里历史写出来,回馈给它的诞生地——索马里人的世界。然而,我也希望在本书出版下一个版本前,这种需要将会由一位索马里自己的历史学家来满足。在我试图理解后来年份的文化和政治上,很多索马里朋友给我提出了建议并给予了帮助。由于时间有限,这个新版本的准备工作事实上是一个“速成项目”,我尤其要感谢奥马尔·杜豪德(Omar Duhod)博士、艾哈迈德·优素福·法拉赫(Ahmad Yusuf Farah)博士、奥斯曼·艾哈迈德·哈桑(‘Osman Ahmad Hassan)先生、阿卜迪拉希德·赛德(‘Abdirashid Sed)先生、阿卜迪萨兰·伊赛·萨尔维(‘Abdisalan ‘Isse Salwe)先生、简·哈康桑(Jan Haakonsen)先生和帕特里克·吉尔吉思(Patrick Gilkes)博士。我也要感谢穆赛·加拉尔(Muse Galal)、穆罕默德·阿卜希尔·穆赛(Muhammad Abshir Muse)和赛义德·萨马塔尔(Said Samatar)教授以及著名的自学成才的索马里历史学家谢赫·贾马·奥马尔·伊赛(Sheikh Jama ‘Omar ‘Ise),感谢他们早前的鼓励和长期的支持。我也想起了一些已经故去的朋友,他们是安东尼·马利亚诺(Anthony Mariano)、B. W. 安杰耶夫斯基(B. W. Andrzejewski)和伯恩哈德·赫兰德(Bernhard Helander),我曾希

^① 关于我田野研究环境的更多情况,参见 I. M. Lewis, “An anthropologist at large in the ‘Cinderella of Empire’” in *Blood and Bone, the Call of Kinship in Somali Society*, New Jersey, 1994, pp. 1-18; and ‘Afterword’ in *A Pastoral Democracy*, new edition, Oxford, 1999, pp. i-xxvi.

望和他们就我新写的最后一章进行讨论。我的妻子阅读了本书的最后一章,并为此章成文提供了帮助。新近的历史材料来源丰富,在处理它们的时候,我更全面理解了 E. H. 卡尔(E. H. Carr)的困境,即作为一个现代历史学家在面对信息过剩以及问题选择时所遇到的那种困境是如何塑造历史观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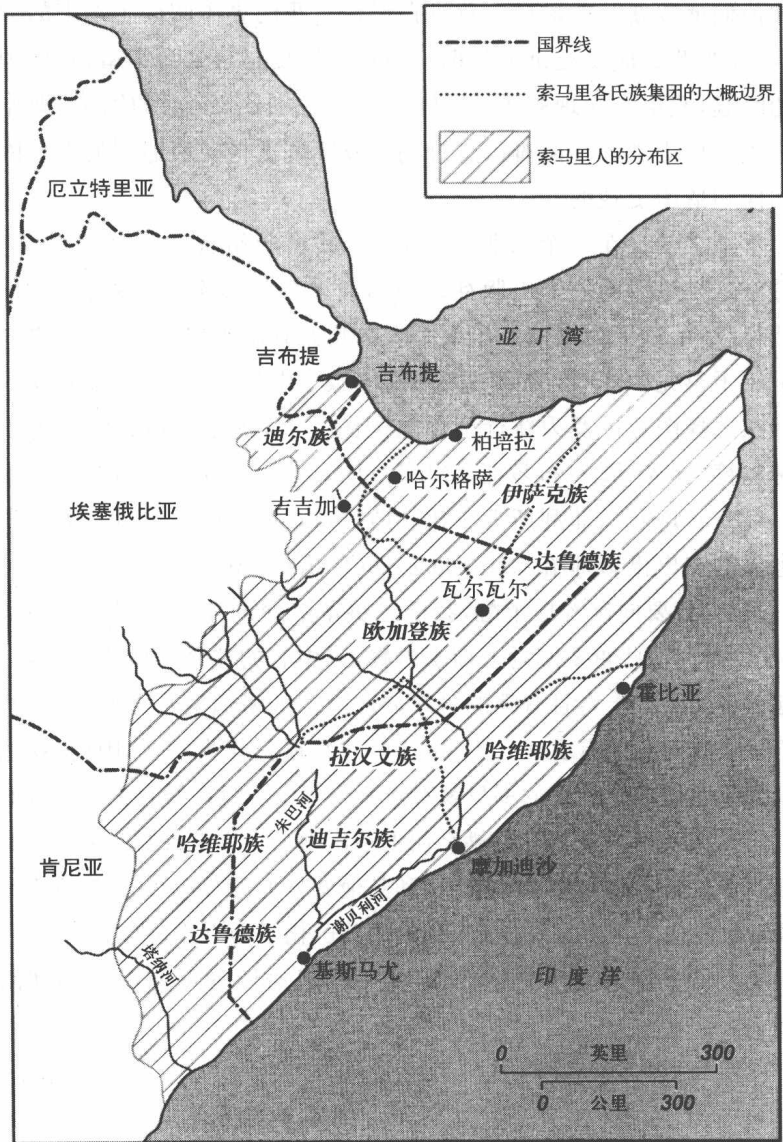
本书之前曾在三个出版社出版过,其出版历程犹如一段游牧史。我希望这是最后的一个出版社。詹姆斯·柯里是本书新发行人,性子虽然很急,不过极为热情且乐于助人。我尤其高兴地看到,本书再一次地引用了早先 1965 年的第一版和其他版本中的插图,并且还配有新的图片。在选择图片以及为新近事件加配图片上,我也要感谢伊斯梅尔·阿赫默德、米歇尔·布罗菲(Michael Brophy)、阿卜杜拉希·杜尔(Abdullahi Dool)、菲里斯提·托马斯(Felicity Thomas)以及关注索马里世界的杰出摄影师哈密什·威尔森(Hamish Wilson)。

最后,我要向读者提个醒,我已经将章节中的注释限制在最小限度内,仅仅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加了注释,其中有的注释还较为详尽,以便引起读者对一些丰富且有趣的材料的注意。如果遗漏了一些材料的话,并不代表我对它们有看法。不过,这些注释还是相当的多,因此,我仍然感到如果不做一个独立的书目就有点不合理了。我在誊写索马里人姓名的时候,一般是用其英国化的姓名而不是用索马里文字拼写的名字。索马里语读者在恢复索马里人姓名全拼和其他调整上没有什么困难,非索马里语读者也能认出并读出本书所采用的用英国化了的方式拼写而成的姓名。如果我严格采用索马里文字的话,非索马里语读者可能就要感到困难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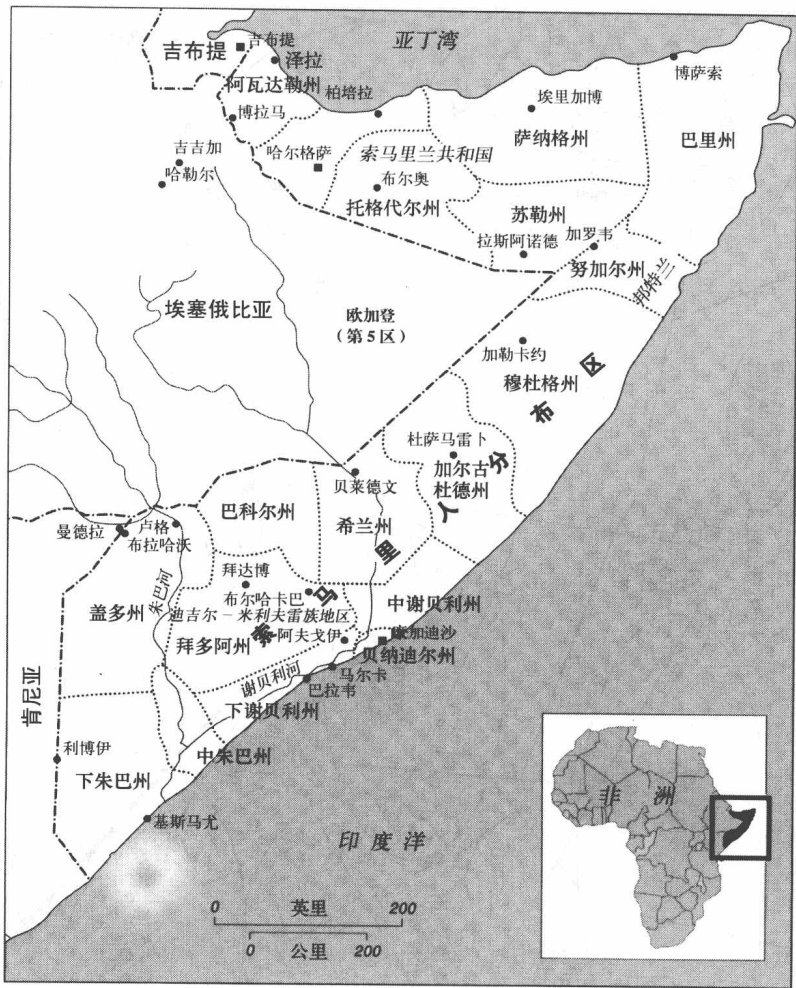
约安·刘易斯(Ioan Lewis)

伦敦,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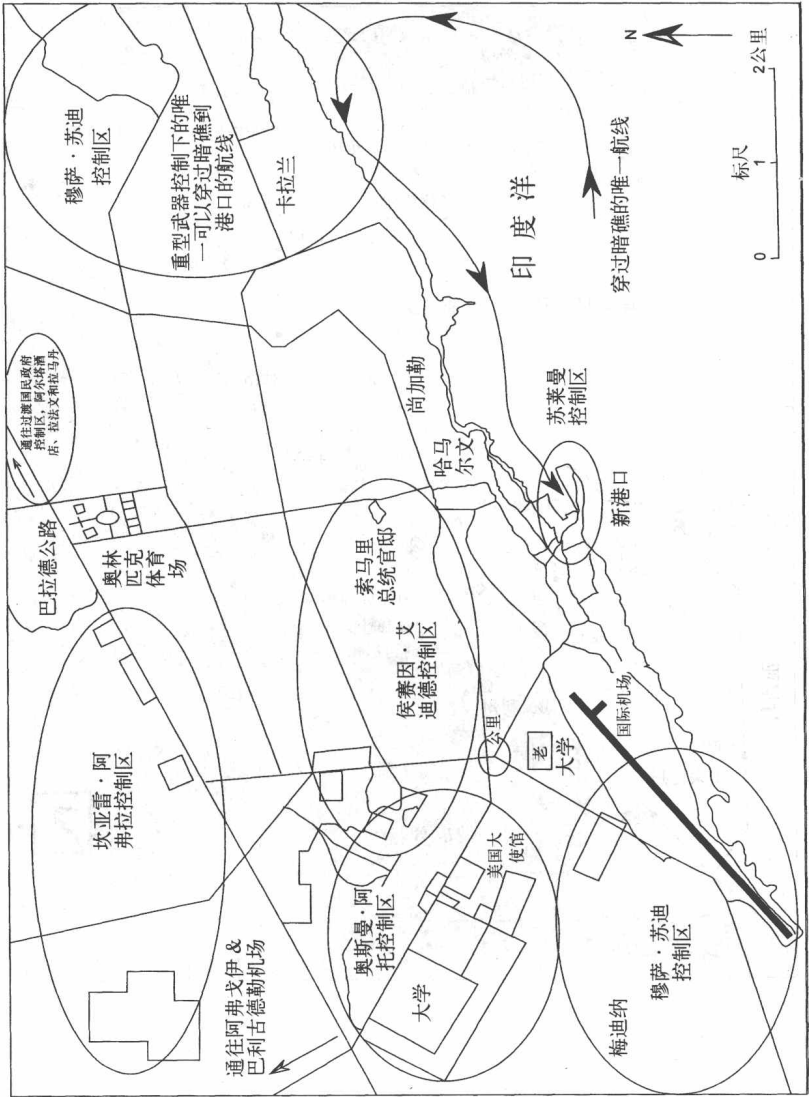
^① 参见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London, 1964.



地图一 索马里的族群与氏族分布图(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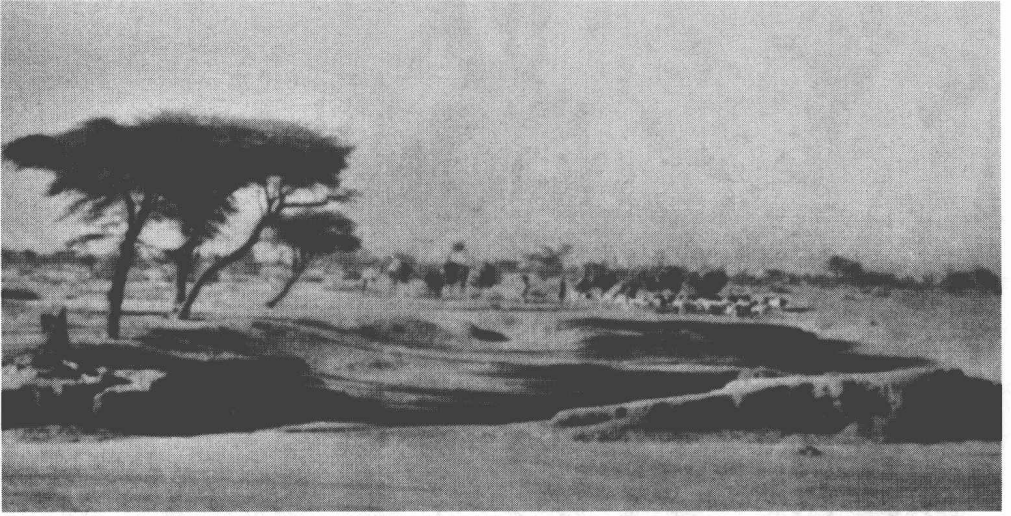


地图二 索马里国家与地区(2002年)



地图三 军阀对摩加迪沙的割据(2001年)
 (在 Mohamed Rashid 和 John Drysdale 绘制的地图上加工而成)

领土与民族



1. 在清晨赶往干涸的河床的游牧家庭(索马里兰)。在干燥季节里,游牧民为了寻找牧场和水源必须经常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
2. 在索马里南部的谢贝利河畔,一个年轻的牧民和正在饮水的牛群。





3. 索马里西北部哈尔格萨与博拉马之间可耕区上的一块成熟了的高粱地。这一地区是索马里北方种植谷物的主要区域。



4. 一位南索马里部落酋长和他的两位妻子及一名部落警察。在索马里南部谢贝利河与朱巴河之间的农业地区，典型的住房就是这种圆形的篱笆浆土屋。
5. 达瓦帕尔玛河是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西北的边界线，位于在索马里人居住的肯尼亚东北地区的最北部地区，水源较多。在这片半沙漠地区的其他地方，水是极其稀缺的东西。

